

灾害何以进入文学视野:论灾害文学的产生与影响

檀晶

(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灾害之所以能够进入文学视野,就文学作为一种活动系统而言,灾害符合了文学书写所必备的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要素;另一方面,灾害自身的特性所带来的悲剧性为中国文学创作带来很大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历代中国文人创作的指导思想;在题材、艺术表现和风格等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在民族性格作用下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学”,在为后世灾害救治提供可资借鉴的途径与方法的同时,起到了“文史互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灾害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文学也成就了灾害的历史感性表现。

关键词:灾害;文学视野;灾害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4-0045-07

自古以来,人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诸如水灾、旱灾、雪灾、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并在与各种灾害不断斗争中向前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相继发生了诸如非典、雪灾、地震、洪水、虫灾等自然灾害。灾害面前,社会各阶层戮力同心,积极应对,终使人类战胜了灾害。与此同时,灾害的发生也推动其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中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分。作家围绕灾害进行了多角度文学作品创作,他们“从历史、现实、寓言等维度进行了大量丰富的书写,生动地记录了中华民族与非典、雪灾、地震等灾害顽强抗争的不屈画面”^[1]。

然而,任何一种题材在文学中的出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以灾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亦有其特定的背景。“灾害带来的恐惧、破坏、伤痛和死亡,抗灾、救灾和重建家园、拯救人生等过程中展露出的对人的尊严、生的权利的捍卫,对爱的力量、生命奇迹的演绎以及对人之生存、死亡的终极追问等等,都为文学提供了可供观照的对象以及‘究天人之际’的重大问题。”^[2]在灾害面前,“文学以自身的方式对灾害的反映或反思,在现实层面指向苦难、友爱、死亡等具体事项,在意义层面通向人之生存的社会属性、诗意本质及宗教关怀”^[2]。当灾害和文学具备了碰撞的可能,灾

害文学也就成为了文学创作中独特的存在。

一、灾害如何进入文学书写

美国当代艺术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活动,需要具备作品、作者、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且此四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活动系统^{[3]4}。鉴于此,我们不妨改变一下顺序,从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这四要素出发,探寻灾害是以怎样的方式与此发生关系并走进文学的。

(一)世界

反映社会生活与现实客观存在,是文学活动的基本场所,也是文学得以产生的背景。它不仅是作品所反映的对象,更是作者和读者赖以生存的环境。

“自然界是人之生存和认识自身的直接依据,自然不仅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且是文艺创作的灵感和源泉所在,对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2]文学的灾害书写,决定于外部环境提供的条件。中国幅员辽阔,环境复杂,联合国减灾委报告中说: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中国在20世纪

收稿日期:2022-01-02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研究”(12cwxj12)

作者简介:檀晶(1974—),女,山东汶上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40年代之前的“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4]。中国自然灾害种类之多,发生频率之高,灾情之严重,自古而然。灾害的高发与灾害种类的繁多,为文学的灾害书写提供了丰富的客观基础,也使灾害书写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美国学者福瑞茨认为:“灾害是一个具有时间、空间特征的事件,对社会或其他社会系统造成威胁和实质损失,从而造成社会失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支持系统的功能中断。”^[5]⁶⁵⁵ 文学中的灾害书写正是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下客观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失序及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支持系统功能中断的状态,并对此状态加以人性化描述,使之成为历史的永恒。与此同时,“人要恢复和自然的本真联系,才能修复自身的失衡”^[2],因此文学在记录灾害带来的痛苦创伤后,又将描述灾害过后人类的修复过程,以及元气恢复后的平衡世界。

(二)作者

作为文学创作主体,作家除了创作,更是要将自己独特的审美以作品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这个过程也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过程。

文学对灾害的书写,在客观反映现实世界的同时,作为人的思想的反映,文学也在记录着作者的精神世界。“文艺不能预防和阻止灾害发生,只能反映、影响人心,灾害所造成的肉身消逝、精神疼痛、文化损毁,灾害中人性所展露出的善之果、恶之花、生之惑,必将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意向和作品内容。”^[2]因为,“文学记录灾害,也反思灾害,文学与灾害的关系有其现实指向。文学是人的精神成果,是人的内心情感的释放和欲念的外露,读者对照作品反观自己的内心,调整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灾害是人根据自身的被损害与被毁灭而建构的概念,其作为一种外在的‘暴力’,必将影响到人的精神世界,促使人反思自身的生存环境。文学与灾害都关涉到人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2]。灾害的文学书写不只影响着作家的主观世界,也在不断更新着他们对灾害的认识、感受和理解。“根据传统理论,文学就是把矛盾、冲突、非常态的、极端的、人的本质的东西加以集中放大、集中表现。灾难恰好是一个偶然性的典型的

集中爆发的事件,更能把人的心性、情感、价值观念反映出来,把人性放大,把美、丑放到极致,这就是文学最大的魅力。”^[6]文学的灾害书写,就这样在不断修正并记录作家思想的同时,让我们透过作家看到不断变化中的灾害世界。

(三)作品

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灯”,作品必然是文学创作的核心。就灾害文学而言,灾害文学作品是作者连接世界和读者的纽带,也是后世了解和感受历史不同时期灾害所带来的各种情境和不同情感体验的载体。

自先秦时期始,自然灾害即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一定位置,这一时期出现的神话、诗歌和散文等文学,均承载了对诸如洪灾、虫灾、地震、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的客观描述。“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神话描述了不同的自然灾害,同时也展现出先民对灾害的应对处理及对美好结果的期盼。《诗经》中《大雅·云汉》《小雅·古风》对旱灾的描述、《小雅·十月之交》对地震的描述、《小雅·大田》对虫灾救治的记录等,均是现存可见诗歌中最早关于灾害的记录。而甲骨卜辞、《春秋》《尚书》《国语》等散文则以灾害为对象,展开对国家政治的讨论。

秦汉以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和多样化进程的发展,以及自然灾害形式的越发多变,文学对灾害的记录也日趋多样。文学不但在诗、词、文、赋、小说等体裁中继续忠实记录着自然灾害的发生、人们对灾害的反应和应对,更表达着作家对灾害的理解、感受和体会,以及面对灾害而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探讨、建议和期冀等。每一种文学体裁对灾害的书写,均在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展示了灾害的各个方面。以水灾的文学书写为例,在神话中,水灾多描写地上之水而形成的洪灾,如“女娲补天”中的“水浩洋而不息”,“鲧禹治水”中的“洪水滔天”;在诗、词中则多写因“雨霖”而形成的“涝灾”,如晋代张载的《霖雨诗》、唐代高适的《东平路中遇大水》等。不同体裁的灾害书写,使各种灾害以更立体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四)读者

作为文学接受的主要对象,读者不只发生阅读行为,他们还在此行为基础上与作者之间进行

更深层次的精神沟通。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鉴赏,作品本身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灾害文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有两类:一是需要借此了解民情,有着强烈政治需求的统治阶层;二是进行灾害文学创作的文人群体。在这两类人群中,前者因了解民情的政治需求而成为灾害文学读者群体容易理解,文人群体缘何也会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读者呢?究其原因,除其自身特质外,似乎还与灾害文学的悲剧性密切相关。一方面,悲剧是“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7]79-80}。自然灾害高强度的破坏性正符合了老舍所说的“描写生死关头的矛盾和冲突”,而浸润于儒家思想中的中国文人所独具的“悲天悯人”情怀,使其更容易将灾害作为文学书写的主体。另一方面,“悲剧的目的,至少是悲剧目的的一个要素,乃是快感,但并不是指一切快感,而是指靠了艺术表现(直译是‘靠了模仿’)从怜悯和恐惧中产生的快感”^{[8]87},即悲剧所带来的“快感”满足了读者的精神需求。与西方悲剧意识偏于揭示困境相比较,“中国悲剧意识则更偏于弥合困境”^{[9]108},这使得灾害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相对完满的结局,从而弥补了灾害的悲剧性一面,进而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精神“快感”。

二、灾害自身特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灾害能够进入中国文学,除其满足文学书写所需要的诸多要素外,还与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关系密切,反过来也形成了中国灾害文学书写的独特性。

(一)因灾害而形成的传统“灾异天谴”等思想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观

灾害的出现与被关注,形成了中国灾异天谴、天人合一、忧患意识等传统思想,这些思想最终成为儒家的重要思想,在作家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指引作用。

客观而言,由灾害所引发、形成的灾害意识促进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李世泰认为,所谓灾害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危机意识,是指人们对灾害现象的主观反应……主要包括哲学意识、

心理意识、思想意识和经济意识等”^[10]。其中文学书写中最为典型的“灾异天谴”说即是一,这是中国传统灾害思想中最为持久且被广泛接受的部分,贯穿了中国古代整个灾害历史。而忧患意识则在儒家思想推动下,成为中国文学中被充分表达的文学主题之一。

关于“灾异”,《春秋公羊传》中认为,“灾”指如水灾、旱灾和虫灾等已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祸难,而“异”是如地震、陨霜、杀菽等没有形成直接伤害后果,但其危害程度远大于灾的特殊自然现象^{[11]146}。在人们无法解释灾异形成原因时,儒生董仲舒的“灾异谴告”成为封建统治秩序下最易被人接受的解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怨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12]54}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借用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概念构建了一个具有人的意志的自然之天^{[12]98},且“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12]71}。“董仲舒及其信徒们惯用某些自然现象如日蚀、地震、水灾、火灾、动植物的反常变异来作为上天对人君的警告,这也几乎成了后世的常规。”^{[13]149}天人合一的灾异谴告思想成为文学灾害书写中惯常的指导思想,历代文学创作在客观书写所发生灾害的同时,也多以此为归因,希冀借此换来统治者的开明政治。在此美好愿望推动下,灾异谴告思想在文学中不断被强化,并最终为文学“文以载道”功能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持。

灾害成因问题解决后,人类如何与自然相处成为人们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此过程中,“道法自然”成为中国天人关系的重要思想。所谓道法自然,即“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在中国人看来,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宇宙的缩影,人和自然应该通过相互作用而达到辩证统一”^{[14]19}。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是一味地征服自然,而是注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同时保护自然”^[15]。中国传统文化自《易经》始即追求仿效自然、顺应自然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先秦思想家们更是在无序的灾难时代进行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但思想家们所思考的,“不是如何加强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不是使人类如何反抗宇宙、世界和自然对自己的控制,而是重新恢复人的平静的、平和的、有秩序的生活……他们的任务不是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去增加人类的苦难,而是要消除这种苦难。他们为我们民族贡献的是消除这种苦难的方式,而不是在这种苦难中意识人的力量和人的意志的伟大”^[16]。《管子》中记录了“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主张,并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管子·八观》)、“衡顺山林,禁民斩木”(《管子·五行》)等对自然生态的保护的具体做法。“效法自然之道的人类应该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属于自然界,人来自于自然且又依赖于自然。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应和谐相处,协调发展。”^[17]

灾害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18]²⁰。中华民族自古即面临着灾害的频繁发生,这使中国先民在应对灾害、记述灾害的同时也开始思考灾害带来的影响,于是出现了《周易·系辞下传》中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至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逐渐形成。而文学中“忧患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作家对人类苦难的一种忧患的文化审美体验,联系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19]。经历过人类苦难的文化审美体验后,作家进一步“把远古初民那种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恐惧感及对神祇的敬畏与服从心理,转化成了一种自觉和有意识的努力”^[19],于是成就了文学史上诸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人的忧患情怀。而灾害进入文学所形成的“忧患意识使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冷静、理性,在苦难面前不妥协,在胜利面前不自满”^[20],正向显示出灾害对国家民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灾害本身在题材、艺术表现和风格等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

首先,灾害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历史的苦难,并借此抚慰人类受伤的心灵,从而使“灾害”成为文学创作中重要且恒久的主题之一。“在人类留下的诸多精神遗产中,到处充满着灾难的痛苦记忆。文学是人类精神和心灵的产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灾难结下了不解之缘,它记录了灾难的种类,描写了灾难的状况,抒写了人类面对灾难的心路历程。”^[21]中华民族自古环境复杂,“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22]⁹²。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先民,通过文学记录下灾害及其带来的苦难,并在此基础上抒发内心的情感,以此抚慰因灾害而造成的精神伤痛。

其次,灾害进入文学,使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悲凉的文学风格与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灾害是人类生活中所不希望发生的极端事件,它所带给人类的创伤与痛苦也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文学进入个体创作时代后,灾难的文学表达也建基于个人的体验和感受。要将个体情感传播开来,感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作者必须超越自我经验的拘囿,将个体的创伤情绪予以澄净,通过恰当的语言并借助想象使其飞翔、升华,在沉重与空灵、痛苦与震撼、残酷与壮美、绝望与希望的纠结中寻找理想的表达方式。”^[23]面对灾害,文学除了记录客观灾害的发生,更在其中倾注了作家的身心感受。因此,“‘灾害文学’不仅仅在于用文学的语言描写、再现灾害发生的具体过程,更主要在于它用文学的形式反映灾害的社会科学属性和自然科学属性,描摹人们面对灾害情境的精神影像,刻画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缓解人们的痛苦与焦虑,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公众的防灾减灾觉悟”^[1]。他们在创作中“将民族的集体创伤嵌入个人心灵,使之代代相传”^[23],人类面对不可抗拒

灾害时自然而然的无助,面对灾后景象产生的悲凉,以及希望扭转悲惨现实的悲壮情怀,成为灾害文学的主旋律。

(三)自然灾害是促进中国“乐感文学”形成的重要因素

就中国文学而言,灾害最初进入文学,往往是以已经发生的悲剧身份而出现的。灾害文学的创作是在自然、社会和人的三维交叉点上所进行的生活场景的艺术图景再现,其核心就是在苦难深重的灾害面前,表达能动性最强的人类如何接受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磨砺。所以,在文学书写中,文人倾向于首先展示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悲剧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创作带来强烈的悲剧意识。

然而,在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顽强生存发展下来的中华民族,并非盲目乐观地面对灾害的发生,而是在直面客观现实、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往无前、刚毅坚强的战胜自然苦难的特性。基于此,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具有“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为倾向或特征的“乐感文化”。与西方“罪感文化”和东方“耻感文化”相区别,中国之所以产生“乐感文化”,其原因在于孔子将“礼乐”制度外在的礼仪规范变为了人们内在的主动诉求,服务对象由神变为人,从而形成了“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的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乐感文化^{[13]246}。“乐感文化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和执着,其所包含的积极意义是不能忽视的。”^[24]乐感文化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13]247}。在此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表现出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25]12},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在此背景之下所进行的带有悲剧特性的灾害文学的书写,也并不只是“为了表现灾害的恐怖以及人类的脆弱,而是通过自然灾害,反映现实,抒发理想,表达感受”^[26]。作家在抒发理想表达感受过程中,会自动进入到“乐感精神”的世界中,这就使得中国文学中灾害书写的悲剧意识削弱,进而转化成面对灾害的积极进取和乐观表达,

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学”。

三、灾害文学研究的意义

灾害作为客观世界中的自然异象,是人类社会中始终无法回避的现实;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出现以来的精神概括,以包罗万象的胸怀承载着人类的精神发展。当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时,灾害即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文学也成就了灾害的历史感性表现。灾害本身所具有的强烈悲剧色彩在为文人带来独特的生活体验的同时,也让他们借助文学记录灾害,并将灾害体验下的个体情感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传播开来。灾害的出现使中国文学在整体民族性格影响下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学。文人笔触下的灾害文学在记录描述灾害的同时也印证着历史的真实。文学书写过程中,作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完成了世界、作品和读者之间的链接。灾害进入文学增加了文学的宽度和深度,使其表达更为深沉和质感;而文学在记录历史痛苦记忆的同时,也为灾害披上了人性的外衣。可以说,灾害与文学的结合,共同成就了二者的历史使命。

灾害文学的出现,并非文学的偶然选择,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最早被关注并沉淀下来的题材内容之一。灾害进入文学后所形成的灾害文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

首先,灾害文学是在现实灾害基础上的苦难记录,可以起到“文史互证”的作用,对补史证史大有裨益。尤其是早期的文学创作,“描述现实生活的眼光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概括,往往带有与生活实际完全一致的特色,表现出一种历史化倾向”^{[27]149}。卞孝萱认为,“所谓文史互证,指以史释文和以文证史”^[28]。在传统的文史哲学学科中,历史与文学“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互相证明、互相印证的‘互文性’关系”^[29]。文学最重要的功用之一就是其内容可以作为历史的补充和见证,因为“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30]60},但事实往往是“以历史知识解读文学作品(包括诗、词、小说、戏曲)者多,而以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考证史事者少”^[28]。然而灾害作为文学中的独特题材,除感情的抒发、作者的自身感受外,其事件的发生几乎

不存在虚构成分。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作为一种见证性的文学,灾害文学具有记录历史、抵抗遗忘的功能^[1]。作为对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与艺术加工,文学中的灾害书写基本可以考证历史事件的发生,补充历史记录的不足或缺失。

其次,灾害文学对后世灾害的救治可以起到重要借鉴作用。文学在忠实记录灾害发生的同时,会或多或少记录下当时社会各阶层针对各种灾害所采取的或利或弊的应对策略,这些记录为后世灾害的救治积累了大量历史经验。同时,作家在文学中书写灾害,不仅仅是史家秉笔般的客观冷静,而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灾害的各个方面。透过作家的眼睛,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家的态度,也在不同程度上从文人文学化的语言表述背后,看到灾害发生时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群体性反应,这些记述均可作为后世灾害发生时应对群体情绪提供借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翻阅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而存在的灾害文学,可以获得宝贵的应对灾害的历史经验。

最后,灾害文学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积淀。生存空间的不同,注定不同民族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及其表现亦不尽相同。灾害文学以真实历史为核心内容的书写,让我们看到在历史长河中该地域的人们对待灾害的行为痕迹。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31]149} 中国灾害文学从古代神话开始,就记录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诸如洪水、旱灾、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中华民族在自然灾害中顽强自救,在灾难中拼搏成长,在苦难中涅槃且铸就辉煌的历史。灾害文学的书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畏艰难、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传承与升华。

参考文献:

[1]张堂会.论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书写与文化功能[J].社会科学辑刊,2016(3).
[2]李继凯,周惠.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与灾害书写的若干思考[J].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3]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郇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邓拓.中国救荒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5]Charles E Fritz. Disaster[M]//R K Merton, R A Nisbet.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New York: Harcour, Brace & World, 1961.

[6]何胜莉,游翠萍.生命关怀与审美超越——文学的灾难书写研讨会综述[C].成都:“抗震文艺与中国精神”研讨会,2009.

[7]老舍.论悲剧[M]//王行之.老舍论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8]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9]尹鸿.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10]李世泰.灾害意识内涵探析[J].中国减灾,2007(6).

[11]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4]冯契.“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M]//袁运开,周翰光.中国科学思想史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15]周桂钿.释“人定胜天”——兼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转换[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16]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J].江苏社会科学,2001(2).

[17]帅瑞芳,张应杭.论老子“道法自然”命题中的和谐智慧[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4).

[1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9]罗靖.试论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J].湖南社会科学,2005(6).

[20]赵宁.试论先秦作品中的忧患意识[D].重庆:重庆大学,2011.

[21]王秀臣.灾难视野中的文学回响——先秦灾难的文学表现及其意义[J].灾害史研究资讯,2012(3).

[22]汤因比.历史研究[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23]向天渊.灾难表达理应成为文学的一部分[N].

光明日报,2010-04-23(9).

[24] 一粟. “乐感文化”与中国文学[J]. 云梦学刊, 1990(1).

[25]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26] 伏漫戈. 明代话本小说中自然灾害的书写[J]. 农业考古,2018(1).

[27] 王培元,廖群. 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28] 卞孝萱. 文史互证与唐传奇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29] 凌晨光. 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J]. 江海学刊,2001(1).

[30]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3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Why Disasters Enter the Literary Vision: Occurrence and Influence of Disaster Literature

TAN J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why disasters can enter the literary vision are that for one thing, in view of literature being an activity system, disasters conform to the four factors necessary for literary writing: world, author, works and readers; for another, the tragedy brought about by the disasters' characteristic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The influences are mainly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orm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hinese literati's creation in the past dynasties, enriching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them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style, etc., a formed unique “happiness sense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ac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providing reference ways and methods for disaster treatment and cure in future generation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mutual verific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is context, disasters have become the object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literature has also achieved the historical perceptual expression of disasters.

Key words: disaster; literary vision; disaster literature; influence

(责任编辑 梅 孜, 实习编辑 喻苏妍)